

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导

# 张维佳：让语言学研究为社会服务

文/张驰 本刊记者 王玉君



## 张维佳

1959年3月生于浙江宁波，原籍西安。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国家语委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北京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市语委研究基地）主任，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汉文化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副主任，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位点通讯评审专家，北京市语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究会会长，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汉藏语言学评奖委员会委员，《民族语文》编委等职。

社会兼职有：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高教委员会主任，民盟海淀区主委，政协海淀区副主席。曾任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海淀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等职。

**当**年他曾作为一代热血青年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国家恢复高考后他作为第一批考生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虽然当了中学语文教师，但锐意进取的他后来又读了硕士、博士，直到现在成为了大学教授、语言学家、知名学者。他

就是北京语言大学（简称北语）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兼研究所所长张维佳。此外，他还是北语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除了他的上述身份外，张维佳还有一些社会身份和特殊政治头衔，如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或咨询专家，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高教委员会主任、民盟海淀区主委，北京市海淀区第九届政协副主席等。

## 矢志不渝，追逐梦想

作为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张维佳曾经在陕西省富平县曹村公社一生产大队科研站当技术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喜欢“瞎想”的人，喜欢做什么就问个“为什么”。那时候，他对农作物移栽技术感兴趣，探索为什么移栽后的庄稼产量高。1977年，张维佳成为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参加高考时，因为他对中国画感兴趣，想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毅然放弃理工科转而报考艺术学院。后来因种种原因他考入大学中文系后，又因为对语言及其规律和运行机制感兴趣，便转向了语言学学习与研究，而且还在大学阶段发表了学术论文。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安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但是，张维佳对此并不知足，强烈的求知欲和对未来的憧憬，促使他不断努力、发奋治学，先后考上了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历史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并最终站在了大学讲台上。

在四川师范大学读硕士期间，张维佳有幸得到冉友侨、刘君惠、郭诚永、杜道生、张振德等五大导师的耳提面命，并且开始了对传统语言学和语言文学的学习和研究。硕士毕业后，张维佳到了陕西教育学院教书，讲授《语言学概论》，这段经历使得他对语言学研究目标——探索语言共时结构规律和历时演变规律有了深刻的理解。

199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张维佳从书斋走向田野，开始了对“活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他承担了陕西省高校地方课程教材《陕西方言与普通话》撰写工作，开始对陕西近百个县市展开调查，探索陕西方言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规律及其与汉语普通话的关系。他的专著《陕西方言与普通话》出版后，很快成为被陕西高校广泛使用的地方教材。这项工作为他后来重视活的语言、重视历史语言学 and 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传统语言学到现代语言学、从关心文献材料到关注活的语言生活，进而寻找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整个治学理念发生变化后，张维佳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深造，1996年他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跟从潘悟云教授学习历史语言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学习历史语言学的过程中，他发现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多缺陷，“我们的学术目标在哪儿？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是要解决我们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让中国的问题变成世界的问题，通过中国的语言学材料来丰富世界的语言学理论？”由于之前就有了方言调查材料的准备，张维佳仅仅花了两年时间便完成了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

博士毕业以后，已是不惑之年的张维佳有幸被北京语言大学相中。刚到北语工作时，他被安排给那些零起点的留学生教授汉语课，并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颇具魅力的声音，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听课。于是，他很快受到校领导的重视，被调往语言研究所从事专职科研工作，并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受到学界的重视。后来，他以其多方面的才能、良好的综合素质，被调往学校科研处担任处长，去年又转任校长助理兼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

从一个城市青年变为下放到农村的知青，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到书卷飘香的学者生涯，张维佳的每一步都走得如此艰辛。无论道路如何曲折，他心中对学术的热爱和坚持却始终未变。



作为人大代表，到基层走访调查是张维佳教授坚持必做的一项工作



张维佳与自己的应届博士生合影

### 治学上既“接天线” 又“接地气”

同大多数学者一样，张维佳在他的学术之路上敢于攀登，不断创新，硕果累累。近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获得各种奖项或荣誉。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张维佳的论文《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历》荣获了第六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由他担任主任的北京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2010—2012年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民盟北京海淀区委还授予他2013年度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一等奖。

而与一些学者不同的是，张维佳却是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所谓“接天线”，就是指基础研究必须要在学科前沿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占居领先地位，获得学科话语权。张维佳就是这样一个人“接天线”的学者。他将语言学研究的目标不仅仅针对国内，而且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所贡献。2003年，他那部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的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作为专著出版以后，荣获了北京大学第十届王力语言学二等奖。王力语言学奖可以说是语言学界的最高奖，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很高的认可度和知名度。该书以当时颇具创新力的历史层次分析法，从演化和竞争的视角，把积压在现代关中方言中的不同层次一层一层剥开，用方言共时差异观察历史演变，解释它发展的机制。在历史层次理论初步提出、概念尚不明晰的当时，张维佳可谓是走在了理论的前沿。博士毕业以后，他沿着历史语言学的道路，继续开展探秘语言历史演变的

工作，先后发表了《远指代词“兀”与突厥语》、《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历》、《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层次》等重要论文。

2002年前后，他开始研究语言地理信息系统。一方面他把中国所有地名输入电脑，通过程序管理来进行分类；另一方面，钻研这个软件本身，试图弄清语言地理和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提出方言地理及其历史发展建模的概念。张维佳在治学上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同时也由此开始了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基于GIS系统的语言地理学的理念和路径。之后发表的文章《秦晋之交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白读音的层次》、《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山西晋语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来源》、《汉语方言卷舌音类的地理共现与共变》等都是这一方面的力作。

2004年张维佳来到香港，跟随著名语音学家朱晓农交流学习。在此过程中，让张维佳受益最深的便是科学主义的精神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再走惶惶乎“我注六经”、玄玄乎“六经注我”的老路，而应该使用现代科学与哲学兴起以来的研究方法，不仅要有多方探索的随机发现过程，更要有自动纠错的递归评价过程。技术的革新推动着语言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便捷、高效、高精度的仪器设备使实验和分析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数据、更多维的观察视角。所以，张维佳说，“我们必须要有‘三个走进’：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走进社会”。为了推进国内基于现代技术的语音研究，他翻译了国际语言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几部书——《语音学

教程》（赖福吉著）、《世界语音》（赖福吉、麦迪森著），并正在组织翻译《语言地理学方法》（柴田武著）。

张维佳认为，除了“走进实验室”以外，“走进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即研究成果必须要对现实有用。从近处来说，要对教学有用，再说远一点，要为社会的教育、文化、经济服务，再远一点要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近些年来，在我国语言政策规划问题上，张维佳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案，可以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的关系，使处于相对弱势的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能够进入良性的发展机制，增强自身迎接新时期新形势挑战的能力，而不再仅仅是机械地“抢救”与“保护”；他还对国家新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国语国际传播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重视。

近年来，张维佳致力于“语言文化建设”工作。他说，过去我们谈语言文化，只是一个表层的文化，谈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一个联合短语。这方面从古代就开始重视，古代的语文学讨论的就是这类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字形、字义、字音的变化和演化。现在我们谈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偏正关系，即有关语言的文化、跟语言相关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相关的文化我们都要研究。这种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语言文化的研究，来为社会文化服务、为社会经济服务。如行业用语、广告用语、民间曲艺形式等。同时，可以生成语言产品，可以服务于语言培训、语言测试等等，甚至还能为国家安全服务，比如建立大数据的音库，可以为刑事侦查服



站在大学讲台上的张维佳教授

务。另外，语言文化也可以展示我们优秀的地方文化，张维佳目前正在做的课题“北京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便对古诗文吟诵、北京三山五园的楹联牌匾、口传文化、地名文化等问题进行研究，服务于北京文化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

### 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统筹兼顾

张维佳现今担任着多个职务：不仅是教授、博导，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且还是管理者，是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另外，张维佳还是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和高教委员会主任、民盟海淀区委主委、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海淀区人民法院陪审员，曾任北京市和海淀区两级人大代表。在这么多繁杂的工作中，张维佳善于统筹安排，把各种性质不同的工作都做得很出色，并且能够将学术研究、科研管理、社会工作兼顾起来，使其互为支撑，形成巨大的合力。

张维佳近几年有三项工作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认可：第一是提出了“充分整合辖区科研院所和中央高校的资源、全面提升中关村自主核心区的品质”的提案，后来海淀区提出了一个“1+6”政策，其中的“1”就跟它相关，在海淀区建立一个中院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整合资源，所以中关村、知春路、学院路联合搞了个研究院，就是为了让这些驻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落地。第二，他从2006年就开始调查研究中国高校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曾

撰写《北京高校在首善之区建设中的作用》的调研报告，其中《社会文化建设与首都高校的文化使命》，荣获了北京市委统战部二等奖。在这里面，他强化了高校的文化引领作用，并在推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观点被北京市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采用。第三，他非常关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教育国际化问题，撰写了《世界城市建设和首都高校来华留学教育》调研报告，主要从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这样一个目标出发，来分析北京和巴黎、东京、伦敦、纽约这几个城市在国际化方面，特别是在留学生教育方面的优劣势，来看我们现在的距离有多远，未来怎么做。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人大的一个提案提交上去，也获得了好评。对于下月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张维佳表示，他期待这次全国两会能集思广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一系列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可操作性的改革措施和细则，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在张维佳看来，做社会工作，可以使他对整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趋势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在为学校科研项目的策划选题上就比别人站得高，从而拓展学校的科研空间。另外，通过社会活动可以接触很多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界的知名人物，能够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启示。至于对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影响呢？张维佳认为，它可以使你的学术跳出来，站在更高的上位，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比如我搞历史语言

学，我就站在语言学的高度上；我搞语言学，我就站在人文社科的高度上；我搞人文社科，我就整个地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对张维佳来说已经形成了合力，撤掉一个都会对其他的方面产生影响。“如果没有社会工作的经历，没有管理工作的经历，我自己的学问也很难做得更好。没有社会工作经历，那就不会掌握那么多资源。我觉得我把它们打通了，把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了，要哪一个就把它提出来。”

年轻时曾经做过电台主持人的张维佳，本身就拥有一副好嗓子，再加上巧妙地运用语音学理论对其进行调节，他让自己的声音更富于亲和力、感染力。除了朗诵、唱歌以外，张维佳对书法艺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当然，书法在他那里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一种抒写人生意境的方式。他说，“书法家不是练就练出来的，其实当你的历练、悟性和文化积淀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写就有了。这里边跟你的整个素质、跟你对社会的认知和人生的体悟相关，它自然就散发出来了。这是一种修养。”虽然张维佳已经年过五旬，但在他的学生眼里，他始终是一个充满活力、干劲十足、心态年轻、甚至常常如孩童般纯朴天真的老师。多才多艺的他，时时让周围的学生叹服和仰慕，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张维佳常常用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来与学生共勉。不仅治学如此，人生亦如此。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阶段，他也处过，而且一处就是20多年，当时总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很辛苦，不知道自己方向在哪儿。”第二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他担任科研处长之后尚未取得成果的这几年的真实写照。每天辗转反侧，考虑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为学校争取资源的事情。有时候饭后散步，很自然地就走到了办公室里。如今，他开始慢慢步入了第三个阶段，“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已经能够享受到成功所带来的快乐。

但是，成功的快乐对于张维佳来说只是暂时的，他是一个不断追求，有着远大抱负、敢于担当的学者。对于今后的工作打算，张维佳表示，他将继续以学科重大问题和社会重大需求为导向，坚持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紧紧围绕学科终极问题并结合影响国家、地区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学术研究。□□